

刘招成 著

美国中国学研究

以施坚雅模式
社会科学化取向为中心的考察



SKINNERIAN
MODEL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理论部学术研究丛书

刘招成 著

美国中国学研究

以施坚雅模式
社会科学化取向为中心的考察



SKINNERIAN
MODEL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中国学研究:以施坚雅模式社会科学化取向为中心的考察/刘招成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ISBN 978-7-208-08897-9

I. 美... II. 刘... III. 汉学—研究—美国 IV.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0570 号

责任编辑 齐书深 苏莉莉

封面设计 范昊如

美国中国学研究

——以施坚雅模式社会科学化取向为中心的考察

刘招成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7.75 插页 2 字数 250,000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897-9/C·345

定价 30.00 元

本书由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理论部
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序

美国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伴随着美国商业资本对中国的渗透和美国传教士的入华而发展起来的,传教士、外交官、商人曾是其中的主要骨干。在欧洲汉学的影响下,美国中国学出现和形成,研究目光集中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东方学、汉学研究因战争困扰而受创伤,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却因远东事务变化和“区域研究”出台反而一度顺利,以近现代中国问题研究为主的中国学崭露头角。不过从学科构成角度看,这时的美国中国学仍由历史学唱主角,其他一些学科尚还缺乏参与热情,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与迫害,又使其发展几陷困境。1958年“国防教育法案”的颁布使中国学获得一次重要调整机会,一些专门机构成立为全美中国学研究增添新动力,有关中国研究的专门课程和项目在各大大学纷纷设立,基金会的积极投入更使中国学研究如虎添翼。美国中国学研究由此进入一个突飞猛进期。

然而传统汉学的研究方法和视野不能适应迅速发展的中国学研究的需要。现代中国学的国际视野、多学科问题研究的需要,都促使中国问题研究有一个新的变局,社会科学介入中国学的呼吁由此引发。在美国,1964年底和1965年初的《亚洲研究杂志》连续两期刊登了有关学者的讨论文章,集中探讨中国学研究引用社会科学方法及其联姻的问题。列文森、芮玛丽、施坚雅、莫里斯·弗莱德曼、史华慈、崔瑞德、墨菲、萧公权、牟复礼等学者都参加了讨论,他们已经是当时很有声望的学者和中国学家了。讨论中,学者们提到了传统汉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正在受到严重挑战;强调中国问题研究应该注意吸收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拓展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而社会科学研究也要注意吸收中国研究的经验和成果,学者们强调,西方社会科学如果没有中国文明的研究成果及其经验也将是不完整的。有学者甚至认为,两家本身就是孪生兄弟,相会应在情理之中。当时的史华慈教授还特别提到了反对学科拜物教的问题。《亚洲研究杂志》发表的这些文章,原本是作者们在亚

洲学会年会上的一个专场讨论的发言,再特地发表出来,可见当事者对此问题的关注和重视。现在看来,这场讨论对美国中国学发展进程意义重大,怎么评估也不会低,对后来中国学发展的影响深远。它是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案。^①较之以往,此后的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者,确实都注意到跨学科和多学科研究的问题,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环境生态学等诸多学科理论与方法被糅合一起,中国学研究也由此出现了颇为繁盛的局面和令人惊叹的成果。

施坚雅是当时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作为人类学家,他当时从社会科学发展的角度,特别强调了中国问题研究的重要的学术普世价值。他后来的治学道路,一直积极试图以社会科学的方法,突破中国问题研究中的某些传统模式。在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上,施坚雅在运用社会科学理论促进美国中国学的新转型方面,在倡导新学术理念及其运用实践方面,都可以说是力度最大、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对施坚雅的研究,就是对美国中国学社会科学化进程研究的一个重要窗口,也可以说是十分具象的学术解剖。

刘招成博士试图做的,正是这一工作,他对施坚雅学术生涯及其学术成就的全面探讨,对于二战后美国中国学社会科学化进程深入的梳理,对于其前因后果的细致的探讨,为我们展现了施坚雅个人及其美国中国学社会科学化进程的相当全面的生动画卷。招成的这一成果,对于我们国内学术界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招成是十分努力的青年学者,很会思考问题,他认为转型期间的中国社会的建设、管理和稳定,很需要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的咨询和参谋。衷心祝贺这一著作的出版,也衷心祝愿这本书的问世能成为他学术发展的新起点,以后有更出色的学术业绩和成果!

朱政惠

2009年6月26日

于沪上明日新苑

① 我们已经组织研究生将参与这次讨论的所有重要文章翻译出来,发表在《海外中国学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辑上。

目 录

序 / 1

导 言 / 1

第一章 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与困境 / 15

一、美国中国学的创立与缓慢发展 / 15

二、美国中国学遭遇的困境 / 34

第二章 社会科学介入中国学研究 / 58

一、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 58

二、福特基金会大力推进中国学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 / 70

三、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大举介入中国学研究 / 78

第三章 社会科学与中国学研究结合的典范:施坚雅模式 / 86

一、施坚雅结缘中国学研究 / 86

二、施坚雅模式的渊源分析 / 95

三、施坚雅模式的理论体系 / 115

第四章 美国中国学的原创理论:对施坚雅模式的学术分析 / 146

一、对基层市场社区理论和宏观区域理论的分析 / 146

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施坚雅模式 / 157

三、施坚雅模式的理论特点 / 171

第五章 施坚雅模式对中国学研究的影响 / 183

一、学术界对施坚雅模式的争论 / 183

二、学术界对施坚雅模式的借鉴和运用 / 210

第六章 社会科学的大举介入与美国中国学的繁荣 / 223

一、各种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大举介入中国学领域 / 223

二、美国中国学研究繁荣局面的出现 / 240

第七章 结语 / 258

一、对美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简要回顾 / 258

二、中国学的发展为美国对华政策提供了依托 / 262

三、社会科学发展与我国的社会转型 / 267

导 言

美国中国学的形成要比欧洲晚得多。欧洲汉学(Sinology)研究的历史相当久远,据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记载:“随罗马之勃兴,希腊文化光被之诸地方,统一于罗马政权下,希腊罗马文化扩大于西欧,结果造成东方(Orient)一概念,盖于希腊罗马世界即欧罗巴世界对立之特殊世界也。”^①这个“东方”的“特殊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包括中国,因为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中就记载过阿尔泰地区。自晚明以来,许多传教士东来,著名的即有西班牙的门多萨(Juan Gonzales de Mendoza)、葡萄牙的鲁德照(Alvarezde Smedo)、意大利的卫匡国(Martin Martini)等,他们的著作如《中华大帝国史》(门多萨)、《中华帝国志》(鲁德照)、《中国新图》(卫匡国)等,都是西方汉学中的重要典籍。到19世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汉学在欧洲普遍出现了:1814年法国的法兰西学院创立汉学讲座——“汉族和鞑靼—满语与文学讲座”,首任教授是雷慕萨(Abel Rémusat);1837年俄国的喀山大学建立东方系汉语教研室,首任教授是西维洛夫;荷兰的莱顿大学于1875年建立了汉学讲座,首任教授是曾经创立著名的汉学杂志《通报》的施古德(G. Schlege);英国的牛津大学于1875年(清光绪元年)建立了汉学讲座,首任教授是曾于1839年来华传教、后来并任英华书院院长的理雅各(J. Legge)。美国于18世纪晚期建国,直到19世纪中期,才开始有人研究中国,其中雅裨理(David Abree)、裨治文(Elijian C. Bridgeman)功不可没,但真正为美国汉学研究奠基的人恐怕要数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了。19世纪60年代,就有美国人提议在耶鲁大学设立汉学讲座。但直到1886年,经过艰辛努力,耶鲁大学终于得到了一笔基金,汉学讲座才得以建立,卫三畏也终于被聘为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

①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文化出版社1949年版,第3页。

欧洲汉学在传统上以中国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为中心,所以在研究历史较短的美国似乎感到 Sinology 一词有点过时的味道,一般称之为 Chinese Studies(中国研究、中国学)。由于时代的关系,美国的汉学研究的产生和发展同美国资本主义对东方的掠夺、扩张和文化渗透,以及美国的国际战略和对华政策联系在一起,因而与欧洲的汉学研究稍显不同。1969年,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在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的演讲中指出:在美国,有组织的汉学研究是由1842年成立的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发起的,美国东方学会“在美国代表了欧洲那种对东方学的文学兴趣,这种兴趣曾对启蒙运动有独创贡献”,“但是,美国东方学会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使命感”,“美国的东方研究是与福音传道相联系的”^①。由东方学会组织的汉学研究对美国的意义与价值甚至超过了其他领域,因为美国有组织的汉学研究要比美国系统的历史研究早42年,直到1884年美国历史学会才成立。富兰克林·詹姆逊(J. Franklin Jameson)曾指出,美国历史学会的成立,部分归因于美国东方学会的样板作用。所以,汉学与历史学在美国是分离、平行发展的。

美国独立后,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是领土向西部的扩张和商业资本主义向海外的扩张。到19世纪40年代,随着《望厦条约》的签订,美国对华商业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为了扩大投资市场,美国政府和商人需要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美国国内掀起一股“中国热”,费正清指出,“对于整整一代纽约和波士顿人而言,到中国广东或上海投资比到丹佛或盐湖城投资要容易得多,所获利润也要丰厚得多。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边境比美国边境常常更能吸引人们来经商,正如英国人在十八世纪时所发现的那样。”^②所以,美国中国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这些早期的美国传教士成为首批研究汉学的主要力量,他们把对中国的认识与研究同传教布道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使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已经开始偏离西方传统汉学研究的轨迹,注重考

①② John K. Fairbank, “Assignment for the 70'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4, No. 3 (Feb., 1969), pp. 861—879.

考虑美国的自身政治、经济利益。这种特点许多年来一直被不少中外学者称为美国中国学研究与欧洲汉学研究的“截然不同的特征”。

在 20 世纪的最初 30 年间,美国的历史学和汉学都遭遇了社会科学的挑战,发展缓慢下来了,当时的历史学家们明显地处于守势了。对此,历史学家们的反应比汉学家们快,他们的应对方案是试图使历史学变成社会科学。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费正清指出,美国“历史学不仅仅是一门社会科学,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共同提供了社会科学出现所需要的学术和方法论背景。历史学因社会科学而丰富起来,但是历史学家们的综合性任务依然别具一格。”^①

在历史学之后,美国汉学界对社会科学的影响也做出了反应,不过比历史学将近慢了二三十年。尽管 1925 年太平洋学会的成立,孕育着中国学研究的分化——在古典汉学研究之外,正式出现了中国问题研究。到 1932 年,社会学家莫里斯·普赖斯(Maurice T. Price)在《汉学与社会研究》一文中,从远东以及更具体的中国的政治、家庭、经济、教育等方面阐述了汉学与其他学科合作实质上是一种相互补充,有利于对中国的理解和其学科自身的发展。他认为,汉学家与其他学科专家应该共同合作研究:“无论是东方语言文献和历史方面的专家还是其他任何独立的学科专家都不应将学术的共同合作研究看作是专业化水平的退化或下降。对于其他独立学科的专家而言,通过这种合作将获悉大量一手的关于东方的资料,并且对于他们自己的学科也将作出一些具体的贡献。……汉学家和其他学科专家基于当前实际环境和形势在许多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兴趣,但它并不意味着学术的堕落,因为他们是应用各自的学科观点和方法技巧去处理有关远东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解体、重组这一具体过程的文献,……我坚信,如果这两种类型的学者的研究成果达到了当前他们各自学科所设定的标准,那么在很多方面他们的研究工作一定是相互补充的。”^②

① John K. Fairbank, “Assignment for the 70’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4, No. 3(Feb., 1969), pp. 861—879.

② Maurice T. Price, *Sinology and Social Study*, *Pacific Affairs*, Vol. 5, No. 12, pp. 1038—1039.

在此背景及其他因素的大势所趋之下,美国中国学开始了社会科学化的历程。那么“社会科学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社会发生飞速变化的一个时期,史称“进步年代”。工业化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学者们开始寻求自然科学以外的方法来探讨和研究解决社会问题。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马里安娜(Marianna)首先把“社会科学”作为一个概念使用,很快这一提法就被广泛接受和使用。^①1923年1月,美国的政治学会、社会学会、经济学会、历史学会、统计学会、心理学会和人类学会7个学术团体的部分学者倡议成立“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1924年理事会正式成立,社会科学才开始真正的起步并日渐发展,并大举向传统学科渗透,以至于到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跨学科研究的时代”。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对于介入中国学研究的各种社会科学曾有个说法,认为主要包括现代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等^②,历史学是排除在外的。其实原因也比较明了,历史学早就是汉学研究的主要学科方法之一。可见,中国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考察:其一是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专业学科及其交叉学科进入中国学研究领域;其二是传统的历史学、哲学、文学、艺术等人文科学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借鉴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继续进行研究。具体到研究方法上,它包括移植、模仿和渗透;在研究主题的设计上,出现了跨领域的交叉、重合或融合;对于研究的概念、假定和理论,则采取不同学科之间相互借用等方式。

但美国汉学与社会科学的真正开始联姻是在二战期间及其之后,费正清指出,“区域研究就是这种联姻的产物,而美国东方学会却连一个接生婆都不是。二战前处于领导地位的是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二战期间是战略服务处,其后就是成立于1948年的亚洲研究协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编:《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现状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

② [美]黄宗智:《三十年代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9期。

会了。”^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让美国真切地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但对美国人来说,中国历来是个深奥难懂的孤立的国家,他们非常安土重迁。在费正清看来,要认识中国历史,“似乎得将汉学、历史学、社会科学和区域研究四个领域的研究结合起来。”^②基于收集分析情报资料的需要,美国战略情报局下属的研究分析处除聘请费正清、戴德华(George Taylor)、韦慕庭(Martin Wilbur)、卜德(Derk Bodde)等中国学家之外,还聘用了近千名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为了从大量情报资料中快捷地获取有价值信息,研究分析处打破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因研究方法差异而相互隔绝的状态,创设了一套“战略情报研究方法”,让许多不同学科专业的研究人员从事同一项合作性的研究计划。美国陆军情报局的情报资料分析方法与研究分析处一样也是采用小组合作方法,其远东部中国组是由费正清、卜德和夏仁德(Randolph Sailer)组成。这种新式办法对中国学的发展无疑是极为有利的。费正清事后曾如是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中国学在这个国家立稳脚跟。”^③

这种做法对二战结束后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二战后,一些曾经参与合作处理中国情报的中国学家回到高校后即积极倡导跨学科合作,以期综合掌握非西方区域尤其是远东地区的语言、文化、历史及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为美国的全球霸权提供学术支撑和政策咨询。由此,集中各门社会科学对单一地理区域进行综合研究的区域研究在美国各院校兴起。费正清、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就曾在《通过区域研究理解远东》中指出,应集中人文科学和各种社会科学对远东这一地理区域进行综合研究,中国研究者应在历史学家、语言学家、考古学家、艺术史或是文学家们所熟悉的汉学方法基础之上增加一些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方面的技巧。费正清返回哈佛大学任教后,便开设中国区域研究课程,邀卡尔·弗德里奇(Carl Friedrich)、塔尔考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爱德华·梅

①②③ John K. Fairbank, “Assignment for the 70’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4, No. 3(Feb., 1969), pp. 861—879.

森(Edward S. Mason)等社会科学家开设讲座,以及不同学科方法的专家学者参与他组织的讨论课程。1947年,费正清在哈佛大学全面实施其区域研究规划,由于区域研究为历史学家运用社会科学思想提供了工具,中国历史研究在亚洲研究协会的支持下很快打开了新局面。跨学科的区域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后,将中国研究作为一个文明整体的传统汉学也采取了跨学科研究法,并变得愈益普遍了。这样,美国汉学研究开始了以社会科学化为导向、以各种中国问题研究为主的现代中国学的转变过程。

但是,在当时的冷战格局下,因为中国革命胜利的筹码使美国国内政治天平失却平衡,美国国内兴起了麦卡锡主义政治迫害狂潮,中国学研究领域成为重灾区之一,刚出现的良好学术局面戛然而止,社会科学介入中国学的进程自然也就暂告一段落。当时在美国讲授社会科学的教师如果不在课堂上大骂苏联和共产主义就会被解雇,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费正清、谢伟思(John Service)等均遭到指责,甚至在美国无处容身。总而言之,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前,社会科学与中国学的联姻虽有一定进展,但发展非常缓慢。林德贝克(John M. H. Lindbeck)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学科大都缺乏从事中国研究的兴趣。^①费正清认为,把各门社会科学与中国问题研究联系起来,需要再花10年时间。^②

历史证明,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为美国带来的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政治灾难。中国并没有因为麦卡锡主义而受到损害,而在反共狂潮下,美国当局对中国是否会出兵朝鲜却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在朝鲜半岛上出现了美国与中国的直接军事交锋,结局又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失败。此后,中美就进入长达20年的对峙时期。“麦卡锡主义时代”结束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因人员资金不足、资料信息的匮乏等因素,仍

① Lindbeck, John M. H., *Understanding China: An Assessment of American Scholarly Resources*. New York, Praeger, 1971, p. 30.

② John K. Fairbank,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Ten-Year Report of the Director*, Harvard university library Mar. 1971, pp. 7—8.

一时难以打开新局面,而了解飞速发展的中国又迫在眉睫。于是,在美国政府和各基金会的推动扶持下,中国研究很快得到重视。尤其是福特基金会大力促进社会科学家加盟中国学研究领域,而这恰好与二战期间费正清等人倡导的区域研究情投意合。美国中国学社会科学化的轮子终于全面启动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等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大举进军中国学研究领域,美国中国学研究很快就出现了繁荣局面。

人类学家施坚雅(George William Skinner)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涉足中国研究领域的。20世纪40年代末,施坚雅开始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到成都一带进行田野调查,50年代转向东南亚华人社区的研究,60年代重新回到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他从农村研究着手,开始酝酿构建其理论模式;60年代末至70年代,着眼于中国城市研究以完成其宏观区域理论研究模式。这一套理论模式在国外中国学界有着独特的影响与地位,被学界同仁称之为“施坚雅模式(Skinnerian Model)”。它是施坚雅在20世纪60—80年代研究中国明、清社会历史的过程中,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着手,融合了经济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生态学等多种社会科学的方法与理论,精心构建出来的一套理论模式。堪称美国中国学研究社会科学化的典型范式。

施坚雅首先从研究中国四川的农村社会入手,总结出了一些带有理论性或经验性的结论,如市场层级理论、农村集市集期排列规律理论、基层市场社区理论、传统时代市场与中心地的变迁理论等。他认为中国的农村集市由下至上分为三个层次:基层市场、中间市场和中心市场,并各自对应基层集镇、中间集镇和中心集镇三级中心地。基层市场是地方市场体系三个层级中最低的一级,它是能满足农户所有基本贸易需要的农村集市,不仅是市场区域内农户交换商品的场所,还是农户生产的手工业品向上流通到更高级市场系统地起点,也是供应小农消费的货物向下流动的终点。典型的基层集市是拥有大约18个村庄1500个农户的中心地,这种市场的腹地,是面积约50平方公里的六角形地区。农民终其一生,基本就在这个范围内活动,每个小农都与该区域内的所有成年人有点头之交。基层市场社区是亲戚、宗族组织、秘密

会社、宗教组织、方言以至于“小传统”的载体。随着中心地(居民点)的增加、交通条件的改善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会促成市场的产生和现代化。

在后来的研究中,施坚雅将农村的中心地层级继续向上延伸至中心都会而构成八级中心地,并按自然地理和经济资源等因素,将明清时期的中国分为九大区域,即华北区域、长江上游区域、长江中游区域、长江下游区域、东南沿海区域、岭南区域、西北区域、云贵区域及满洲区域。施坚雅认为满洲区域在19世纪90年代尚在开发之中,城市体系处于胚胎阶段,未作系统分析。八大区域内部各有一套功能与结构完整的系统。当时交通条件的有限,使各区基本处于独立状态。各个区域内部因资源与发展程度不一,因地理结构与位置不同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施坚雅据此又总结出“核心—边缘”理论,即每个区域都可分为“核心”与“边缘”两大部分,两者在资源、交通、经济发展方面存在极大差异。在区分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空间差异后,施坚雅又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他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时间概念,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不是按朝代周期整体变迁的,而是以区域为单位发展,各区域此伏彼起非同步前进的,这就形成了他的“区域发展周期说”。在施坚雅看来,区域空间的制度同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透视点和相遇点。他认为,通过区域空间的组织,不仅可以观察非正式的制度,还可以观察行政体系。同时,非正式的市场区域与正式的行政区系建立在同一基础之上,该基础就是自然地理形貌基础上形成的空间区域,进一步地说,国家与社会不是对立的,而是在社会空间上互相兼容、密不可分的。

施坚雅运用多种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创立出一套研究中国社会的理论模式,打破了以前美国中国学家长时期内研究中国时将农村与城市相分离的局面,将农村与城市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内,并认为其理论模式在其他地区与国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无疑在学界内影响巨大,他本人也当之无愧成为学界著名的中国学家。

除施坚雅外,当时还有许多其他的社会科学家先后进入中国学研究领域,如同样从事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他其实比施坚雅更早进入中国学领域;从事中国经济研究

的有艾克斯坦、盖伦森(Walter Galenson)、帕金斯(Dwight H. Perkins)、约翰·格利(John G. Gurley)、罗伯特·登伯格(Robert F. Dernberger)等;从事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有斯卡拉皮诺(Robert Scalapino,汉名施乐伯)、鲍大可(A. Doak Barnett)、白鲁恂(Lucian Wilmot Pye)、海尔澎(A. M. Halpern)、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林德贝克等;从事中国法律研究的有杰罗姆·柯恩(Jerome A. Cohen)、丹·亨德森(Dan F. Henderson)、克拉伦斯·莫里斯(Clarence Morris)等;从事中国社会研究的有傅高义(Ezra Vogel)、莫顿·弗里德(Morton H. Fried)等。林德贝克对中国研究领域调查后发现,尽管有关共产主义中国经济研究的资料严重缺乏,全美仍有20多位经济学家在从事共产主义中国经济研究。^①

社会科学大举进入中国学研究领域,遭到了一些传统汉学家们的指责。1961年,由研究中国古典文化、艺术、哲学和历史的汉学家组成的哈佛大学东亚文化视察委员会对哈佛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提出指责和异议。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认为“哈佛大学应集中力量继续研究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在中国历史、哲学和古典文学方面开始的具有突破性的东西”。他称由费正清领导的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所开展的当代中国研究项目对中央情报局来说可能显得更左些,“对没有沉湎于假科学梦想的严肃的学者来说,几乎完全缺乏兴趣”,他建议哈佛应拒绝最近已由福特基金会授予的用以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90万美元。约翰·波普(John Pope)表示说,他目睹了“一个优良的学术传统被无情毁灭的最后的、不可避免的阶段”。富路特(Carrington Goodrich)希望“在哈佛大学引起一种回到古典人文主义研究去的转变。”卜德评论说,对近代远东问题的研究,“不应当在损害传统的远东问题研究的情况下被扩大,对传统的远东问题的研究已使哈佛得以出名。”^②哈佛大学东亚文化视察委员会之所以不满,原因在于当代中国

① Lindbeck, John M. H., *Understanding China, An Assessment of American Scholarly Resources*, Praeger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1971. p. 104.

② [加]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239页。